

鲁迅状告“顶头上司”章士钊

因支持学生“驱杨”而被免职

1912 年 2 月，鲁迅经好友许寿裳的推荐，进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工作。同年 8 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教育部金事。

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各部的最高首长为总长，副职为次长，以下设参事、司长、金事、科长、主事、科员。当时不设处这一级，司下面便是科，而“金事”是司长的助手，相当于副司长或司长助理。

1925 年 8 月 15 日，鲁迅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他的上司、教育部总长章士钊，还交纳了 30 块诉讼费用。当时有人问他：“你请不请律师？”鲁迅说：“这个事情我自己来。”

平政院受理此案后，章士钊即以教育部名义进行答辩，一时间鲁迅与章士钊的互辩你来我往，成为一起夺人耳目的“下告上”诉讼案。

事情要从 1925 年 8 月 4 日说起。这天，刚刚再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正要走进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却看到校门口贴着“教员不得出入”的一纸布告。这个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布告，源于一年前的一场风波。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毛邦伟是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旧友。1923 年，应毛邦伟之邀，鲁迅应聘兼职做了女师大国文讲师。

1924 年，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的姑妈，她笨拙地穿梭于世俗政治与教育之间，希望自己的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反对他们涉足政治。杨绛曾评说道，

她的姑妈多年在国外苦读，没看见当时国内的革命浪潮，不了解国内的形势，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像个婆婆似的什么都要管。然而那时的女生，比如许广平，思想活跃，热爱国家，关心世界。岂能如她之愿，一门心思只念书呢？

1924 年秋天，杨荫榆勒令三名未能按时返校的国文系学生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由此引发了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鲁迅卷入这场风波的直接原因，是许广平亲自上门求救。他坚定地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对抗。

章士钊并未因为布告而止步，他查看了“驱杨运动”中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长办公室门上的封条，并现场询问了几个学生，然后不动声色地离开。回到教育部的章士钊，呈文给段祺瑞政府，要求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四天后，教育部的一纸命令传到女师大。在愈演愈烈的“驱杨运动”中，这纸命令无疑是火上浇油，北京各校千余人整队到章士钊家进行抗议，甚至有学生冲入章宅，将章宅捣毁。

就这样，1925 年 8 月 12 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金事的职务，理由是他身为教育部官员却支持学生对抗政府。

第二天，即段祺瑞收到章士钊呈送公函的当天，就下令照准了。

自拟起诉书，控告章士钊

在教育部工作了十多年的鲁迅没

有想到自己忽然被免职了，于是气愤的他爽快地拿出三十块大洋状告章士钊和教育部。

1925 年 8 月 31 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晴。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访季市不在。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季市来。

按照当时《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规定的相关条文，政府对鲁迅的免职，应该先交付“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经讨论同意后再施行惩戒。

其实，对于免职的程序，章士钊是一清二楚的，他在 8 月 12 日的呈文中，专门写上了“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

这个程序上的纰漏正是章士钊的软肋，鲁迅就此抓住机会，决定打蛇打七寸。

两天后，鲁迅自拟起诉书，控告章士钊。8 月 22 日，鲁迅赴平政院投递诉讼状。9 月 12 日，平政院正式决定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

章士钊不仅仅是教育总长也是司法总长，他本身精通法律。平政院把鲁迅的诉讼副本递交章士钊，章士钊巧妙地以《官吏服务令》进行答辩，有意回避《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

10 月 13 日，平政院给鲁迅送来章士钊答辩副本，10 月 16 日，鲁迅进行了回辩。在案件审讯期间，鲁迅的同事兼好友许寿裳还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声援鲁迅。

官司以鲁迅完胜而告终

1925 年 10 月 30 日，鲁迅在《从胡须说以牙齿》中回顾了这桩让他无法

释怀的行政官司：他说章士钊的答辩书，“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拒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对于章士钊的这段答辩，鲁迅冷嘲热讽反驳：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即便精通法律的章士钊在辩书中已经提出了处罚条例，却仍不能顺利驳倒鲁迅。无可奈何的章士钊，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答辩状中委婉地承认“补办”程序确实违法，但是他辩解道，当时女师大形势严峻，如果不果断处分鲁迅的话，只怕其他人会跟着起哄，事件就更难平息了。

经过一番辩驳之后，1926 年 3 月 23 日，平政院以互辩书中的理由作出裁决书，判决章士钊呈请免职之处分违法，最终，撤销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鲁迅官复原职，心满意足地回去上班了，随后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鲁迅意犹未尽，于是，一篇著名文章横空出世——《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在文章里把章士钊称为“落水狗”，从此这个绰号不胫而走。这一场同僚间下级告上级的官司，以鲁迅完胜而告终。

据《民国大律师》韩松 王银新 / 编著

围绕历史剧《屈原》的一场斗争

1942 年 4 月 3 日，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当天演出盛况空前，至《雷电颂》高潮，台上屈原借着庙外咆哮的风、轰隆的雷、闪耀的电，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台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应和，整个剧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紧握着郭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

《屈原》此次演出分两轮进行，首轮演出在 4 月 3 日至 17 日，第二轮在 5 月 13 日至 15 日，前后共演出 22 场，观众达 3.2 万人次。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气氛终被彻底打破，国统区人民普遍感到该剧“替民众痛快淋漓地呼出了一口怨气”，受到极大鼓舞。

国民党方面对《屈原》上演引起的反响十分惧怕与仇视，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等报刊进行围攻、诋毁，企图抵消其巨大影响。周恩来立即作出反应，安排《新华日报》协同《时事新报》等进步报纸，推出大量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意义，同时以《屈原》唱和为题，广泛征集和发表有关《屈原》的诗作。各界知名人士、文坛宿将等纷纷应和，以 100 多首诗作肯

定和赞扬郭沫若的非凡胆略和卓越成就，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借攻击《屈原》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郭沫若亦撰文《历史·史剧·现实》并公开发表，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回击国民党“御用”文人所谓“失实”攻击。

蒋介石对此甚为恼怒，厉声斥责道：“这出戏搞得如此沸反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严令陈立夫等人查办。遂由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出面，举行所谓“文艺界招待会”，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实则下达禁演令。会上，潘公展质问：“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与会的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紧随其后，对《屈原》大骂一通后，要求立即禁演。潘公展借口“顺从民意”悍然同意。在场的《屈原》演员报以一阵叩击盖碗茶杯声表示蔑视，然后在郭沫若率领下愤而起身，大义凛然，昂首阔步退出会场，以示严正抗议。

《屈原》在重庆演出结束后，剧组旋即移师北碚再战。行前，周恩来特意在郭沫若住处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并发表讲话：“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据《党史博览》 朱安平 / 文